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权威
时段
最短
速度
最快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 中 / 国 / 文 / 化 / 阅 / 读 / 书 / 目

台湾·胡万川 / 著

Hu wanchuan

TINGGURENSHUOSHU
SONGMINGHUABEN

宋明话本

听 / 古 / 人 / 说 / 书

快读



先自春光似酒浓，时听燕语透帘栊；小桥杨柳飘香絮，山寺绯桃散落红。莺渐老，蝶西东，春归难觅恨无穷；侵阶草色迷朝雨，满地梨花逐晓风。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权威
学术
最短
时间
最快
速度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 中 / 国 / 文 / 化 / 阅 / 读 / 书 / 目

台湾·胡万川 / 著

Hu wanchuan

TINGGURENSHUOSHU
SONGMINGHUABEN

宋明话本

听 / 古 / 人 / 说 / 书

快读



207.41
144

先自春光似酒浓，时听燕语透帘栊；小桥杨柳飘香絮，山寺绯桃散落红。莺渐老。蝶西东。春归难觅恨无穷；侵阶草色迷朝雨，满地梨花逐晓风。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明话本快读：听古人说书 / 胡万川编撰，-2版. -海口：
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，2003.12

(中国历代经典宝库)

ISBN 7-80564-873-5

I. 宋… II. 胡… III. 话本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宋代
缩写本 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805 号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宋明话本快读——听古人说书

编撰者：胡万川

主 编：符国栋

副主编：周小华 高 丰

责任编辑：何晓玲 卫淑霞 杨伟祯

执行编校：丛 超 周小华 周 磊

※

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.海口市金盘区建设三横路2号)

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

2005年1月新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00

字数：1.2 千万 印数：0001 — 2000

书号：ISBN 7-80564-873-5/K · 27

全套定价(60册)：1500.00(元)

总序

一个中国古典知识 大众化的构想



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，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：中国文化的基调，是倾向于人间的；是关心人生，参与人生，反映人生的。我们的圣贤才智，历代著述，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，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。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，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，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，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；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，樵夫愚能的顿悟众生；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、戏曲，村里讲谈的平话、小说……等等种种，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、乡土芬芳，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；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、对社会家国的情怀、对苍生万有的期待，激荡交融，相互辉耀，缤纷灿烂地造成了中国——平易近人、博大久远的中国。

可是，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，对于



这样一个历史悠久、胸怀天下的文明，这样一个塑造了我们、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，可有多少认识？多少理解？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、把握的可能呢？

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，就是我们的莘莘学子、读书人，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，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？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？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，连“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”，遑论其他？

特别是近年以来，电视、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，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、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。西方一位著名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，固然说明了这一现象，但真正的问题，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，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“优势文化”的辐射圈内，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。

何况，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。自内在而言，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，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，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，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“小学”教育，属于读书人必备的“经学”常识，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，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。自外在而言，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，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，对传统意识的批判，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，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；它也同时疾风迅雷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，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



源，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，漫漶了精神的面。

几十年前，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在一份报告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欧洲力量的来源，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；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，才能真实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。

事实上，现代的学术研究，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。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，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；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，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，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“支援意识”的能源；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，除了科技以外，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。在这里，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、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，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，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，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。

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辑印行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。

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，我们也都看到，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，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，颠沛造次，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、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——孔子的汇编古籍、有教无类；刘向的校理众书、编目提要；郑玄的博古知今、遍注群经；乃至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，王心斋的深入民众、乐学教育……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，或由政府的推动，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、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。



辛亥革命以来，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、读经运动的倡行；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撰印行了相当数量、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。遗憾的是，时代的变动太大，现实的条件也差，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，拙于宣导，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；这一切，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，和它的大众化，离了题，触了礁。

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，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，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，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。

我们的基本态度是：中国的古典知识，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。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，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，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，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遗产的事业中来；何况，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，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，那么大的生活意义——说得更彻底些，这类经典，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。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？

为此，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，除了文笔的生动流畅外，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的专业、学者，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，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、深入浅出、趣味化、生活化的蕴义。

也是为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书，除了面向多层次的读者外，还考虑到青少年读者。毕竟，这是一种文化扎根



的事业，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。在最有吸收力、阅读力的年岁，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，我们的青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、广博的经验为友，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，而我们所谓的“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”，才不会是一句口号。

这也意味了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期盼，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。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中国的知识、中国的创作，能够回流反哺，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，使每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，都能喜爱它、阅读它。

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，它的包容与广大。每一时代，每一情境，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；它们或惊或叹、或悲或喜，或温柔敦厚、或鹏飞万里，虽然形式多端、诉求有异，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。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：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。像《四库全书》对佛典道藏的排斥，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，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中国的科技知识、经济探讨、敦煌遗墨，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、历史价值的肯定、多样内容的考量下，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，归纳综合，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五十八部经典。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，希望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

我们所以采用“经典”二字为这六十部书的结集定名，一方面是一——《说文解字》所释的，“经”是一种



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；《广韵》所说的，“典”是一种法，一种规则。它们的交织运作，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，给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，生活的秩序，情感的条理。另一方面——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：它们是“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”一些书。我们相信，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，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。

与这个信念相表里，我们在这六十部经典的编印上，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。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，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，我们企冀于提供的，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。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，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，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，阻碍了可能的欣赏，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滞旨了。

但在另一种意义上，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，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，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；当然，这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新的解释，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。

也是在这种种实质的、阅读的要求下，我们不得不原书有所去取，有所融汇与变通。譬如，原典最大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，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，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。新版的《帝王的镜子》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，形式也类同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体裁，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，虽然字数浓缩了，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，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。其他的部分经典，也有类似的写法。



这方面，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。远的不谈，就以汤恩比的《历史研究》来说，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，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，畅销一时，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。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再如，原书最少的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，短短五千言，我们却相对地扩充、阐释，完成了十来万字的《生命的大智慧》。又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书，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，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，各有删节，避免了雷同繁复。……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，体裁富丽，笔路万殊，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，也有过个别的协调，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，交互运用，以便既能充分发挥原典精神，又能照顾现实需要，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。

无论如何，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，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、知识成果。我们明白，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，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，个人发挥，我们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。

这套书，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，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废，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，循序渐进，自浅而深。但愿我们的读者，在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之余，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，去作更高深的研究，缔造更丰富的成果；上下古今，纵横万里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。



是的，我们衷心希望，这套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印，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；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人的呼唤；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；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，在漫漫书海中，照出一条知识的、远航的路——

也许，若干年后，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，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，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，弦歌不辍，永世长青地开启着、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國心灵。

历史在期待。

主编 识

致读者书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无论你们的生活多么忙碌，相信总有休闲的时候，相信你们总看过娱乐性的电视节目，也看过电影。如果你是对戏剧有兴趣的人，或许更常到戏剧的演出场所去看各种戏剧的演出。如果你是歌迷，有空的时候，或许就常往歌厅跑。而如果你是住在乡下或较古老的社区，每当迎神赛会的时候，你一定有过到庙前去看野台戏(目前台湾所演出之野台戏口全为歌仔)或布袋戏的经验。

也就是说，在这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，娱乐事业也空前地发达，即使你再忙碌，总会有过参与一两种你所喜欢的休闲娱乐的经验。但是，朋友们，你们当中有谁听过说书吗？我想，除了老一辈的人以外，年轻的朋友们大概很少有过这种经验



吧！

说书在我国的历史上，尤其在宋朝，曾经是最普通、最受欢迎的一种大众娱乐。但是，曾几何时，它已经在广播事业、电影、电视的冲激下，消声匿迹了。

说书和戏剧一样，同样是一种有着长久历史渊源的民间娱乐活动。可是，它却不像戏剧那么幸运，那么有韧性，经过长期的社会变迁，虽然屡次改变形态，仍然能够继续留传下去。

或许现代的读者，有些连说书是什么，都已经不大明白了，因为它毕竟已经是一种历史陈迹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说书就是说故事，特则是指那种为赚取自己生活费，职业性的“说故事”而言。

其实，“说书”这个名词，尚且不是说故事这个行业的本来名称。它是“说故事”这个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阶段以后的说法。在宋、元以前，他们称这种行业为“说话”。

当时的人在这种场合所用的“说话”两字，指的就是“说故事”。“话”就是“故事”的意思。这种用法，和我们平常所指的“说话”两字是有所不同的。当时的人，称从事“说话”这种行业的人为“说话人”或“说话的”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三个字也就是“说故事的人”的意思。

单纯由“说故事”给人家听这件事，或许可以上溯到远古的时代，几乎人类有了语言，有了家庭组织就有了“说故事”的行为。但是那种长辈讲给



“说故事”；或甚至到了后来朋友们交际应酬，以及宫廷中俳优们的“说故事”，都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讲的“说故事”——“说话”。我们这里所说的“说话”，是专指“职业性的”，艺人们用来娱乐大众，藉以赚钱谋生的那种“说话”。

以目前所发现的可靠资料来说，我们中国职业性说话的产生，或许可以上溯到晚唐。但是，“说话”艺术真正的蓬勃发展，成为民间最大众化的娱乐活动，却是北宋以后的事。整个北宋、南宋时期，说话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最高峰，到了元代，由于戏剧的勃兴，说话艺术才渐渐地开始式微。但是一直到三、四十年代广播事业发达以前，“说话”——后来又叫“说书”，却始终是民间娱乐的一种主要活动，并没中断过。

由于“说话”是两宋时期最重要、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娱乐，所以，一提到“说话”，很容易地就使人联想起“宋代”，就好象提起“杂剧”就使人想起“元代”一样。

宋朝的说话，大部分集中在都市，北宋时期的汴京（开封），南宋时期的临安（杭州），更是前后辉映的两处说话人的胜地。说话的场所多半就在瓦子（市集）等人口集中的地方。两宋时期，虽然各种民间游艺活动，如杂耍、傀儡戏等等也都相当发达，但是，听“说话”却是当时人们最主要的一种娱乐活动。



为了因应市场的广泛需要，提高“说话”的技巧，宋代的“说话”已经有了很专业的分科，其中尤以讲史和讲小说的人数最多，也最受欢迎。“讲史”讲的就是历代兴废变革的历史故事。这种历史故事一个主题通常一讲就是好几天，甚且好几个月。“讲小说”，则是讲历来的传说，以及当时发生的种种感人的故事。包括英雄豪侠、恋爱、神怪、公案等等。通常是一次或二次就能讲完。他们所说的“小说”，以现代的话来说，就等于“短篇故事”。

当时的“说话人”在讲故事的时候，虽然并不像后代的某些“说书”人一样，专门根据某本“书”来开讲发挥，但是也有他们自己的故事“底本”。这种“说话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，便叫做“话本”。“话本”通常是他们的故事提纲，用来备忘的。他们如果要讲得好，就得靠着口才，临场发挥，不能够单是凭着“话本”照本宣科。否则，就没人听他的了。

“说话”艺术的初期，“话本”大概都是“说话人”自己编的。后来，由于“说话”的市场需要愈来愈大，故事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多，便出现了专门为这些“说话人”编故事的“书会先生”。“书会”是当时那些“编故事的人”的同业组织。就像“说话人”也有自己同业组织一样。说话人的同业组织有的就叫做“雄辩社”。由“编故事的人”“讲故事的人”都有了同业组织这一点来看，就可以明白当时的“说话”是多么的发达。

不论是说话人自己或书会先生们编的“话本”，



本来都是不外传的。后来，故事的流传一广，不知道是这些说话人自己，或者书会先生，或者是有心的听众，便将这些原来专供说话人用的“话本”刊印了出来。从此，“话本”就在市面流通，变成了一种供人阅读娱乐的故事了。

“话本”原来是民间艺人的作品，开始的时候，很少受到读书人的重视。流通既久，渐渐地便引起有心的文人的注意，他们或者将话本成套编印，或者模仿“话本”的体裁来创作他们的小说。于是，原来专供说话人用的“故事底本”，就变成了一种“专供阅读欣赏之用”的文学作品，和现代人写小说的意义完全一样了。这是民间文艺影响文学的一个最好例子。

这种文人模仿话本体裁创作的小说，后来有的人就将它称为“拟话本”，表示它们和原来专供说话人用的“底本”有所不同。但是，对我们后代的读者来说，“话本”除了文字比较粗糙俚俗以外，和“拟话本”实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，因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“话本”、“拟话本”，都是印在纸上的小说。我们既然不能再看到当时“说话人”的实际演说，对我们来说，什么是“话本”，什么是“拟话本”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因为，后来的说书者，同样也可以用“拟话本”作为底本，来讲述他们的故事。

在宋代，“话本”一词的意义，曾经包罗很广，不只是指讲史、讲小说所用的底本，同时也指演出



傀儡戏、皮影戏等的故事底本。后来才用来专指“说话”的底本。

但是，到了元代，又有一些改变。元代的人似乎比较偏爱讲史的故事。他们特别称讲史为“平话”，讲史的“话本”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称为“平话”。“平”就是“评”，因为讲史通常有讲又有评，所以才叫做“评话”，简称“平话”。在当时，这个分别是颇为清楚的，就是把讲史的故事底本称为“平话”，讲短篇故事的底本称为“话本”。虽然后代的人有时又将“平话”和“话本”混淆在一起的，我们认为仍然是分开用的好。

“平话”后来就演变成长篇的历史演义小说：“话本”则一直用来指称所有短篇的“话本体”小说。我们在本书里所指的“话本”，就是这个用法。话本由于本来就是供说话人所用的故事底本，所以它是口语的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白话的。而且说话者为了吸引听众，更常常运用生动的市井俚语。后来文人创作改编的话本小说，仍然保持了这种特色。

另外，说话人当初为了演出的临场效果，更常常有乐器伴奏的演唱场面。也就是说讲故事的人讲了一段故事以后，在精彩处，或描绘特殊的场景时，常常来一段诗词，这一段诗词便是用唱的。这种一说一唱的说故事，在当场敷演时，当然有着特殊的效果，但是，后来把这些话本编成给人阅读用的小说时，诗词等插曲的重要性就逐渐减低了。虽